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九九期 ——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105b)

---

【出版动态】	为什么我要写文革小说《悲情大地》	姚蜀平
【往事追忆】	我的阅读与思考	赵京兴
【书刊评论】	历史是失败者写的——《邱会作回忆录》阅读漫记	吴国光
【读书笔记】	林彪“死党”眼里的毛泽东	颜昌海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出版动态】

为什么我要写文革小说《悲情大地》

• 姚蜀平 •

谢谢各位来参加张风女士举办的‘哈佛文化作坊’活动。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为什么我要写文革小说《悲情大地》”。这本书是香港明镜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的；在前一年，2009年3月，大陆广州花城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题目为《似水流年》的书，这是《悲情大地》的简体字精简版。说它精简，有双重含义：一是内容被压缩太多，尤其第四部，原稿11章，只剩下4章；其结果内容不完整，前后也不连贯。二是我原来在扉页写的“谨以此书献给我文革中去世的父亲、母亲”。可是在出版的书里，这句话没有了；后来我问编辑，回答是：“可能疏忽了。”当然我不相信这个回答（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花城出版社能在建国60周年的2009年，出版了此书）。这也是我一定要在香港出另一个版本的原因。《悲情大地》比《似水流年》多出6、7万字，第四部恢复到9章，基本上是完整的一本书；另外重要的是，扉页上我加上了：“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及千百万无辜亡灵——六十年来在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

下面我先讲第一部分：“我亲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今天我们写历史，或历史小说，都要从故纸堆里去找史实，还要考证。因为谁也不曾在那个年代生活过。但是对那些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特别是重大事件，我们有所见闻和观察，有一定的发言权。至于怎么观察和分析，下面我会谈及。这里先讲一讲我曾经亲身经历了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26岁，大学毕业三年。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革公开推向全社会，就在那天，我被我的工作单位二机部，从千里之外的大西北，押送回北京。当我踏进那座当时在北京尚不多见的八层办公大楼后，发现全楼从一层到八层，整个走廊和楼梯全是贴着挂着批判我的大字报。总有成千上万份，我的头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我的名字被倒写，被红笔打着大大的叉子。和我同时被揪出来的还有几个人，我们一起被称为“黑帮集团”。事情起源于两年前，1964年我们到山西五台县参加四清运动，回来后组织过一次汇报演出。我们这个黑帮集团就是当年汇报演出的编导组。我们中最大的是1962年大学毕业生，最年轻的是1964年的中专毕业生，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我的罪过是自编自导自演了独幕剧《招魂记》，26岁的我被冠以“反共老手”。出身起义军官（此时变成反动军官）的我和另一个出身资本家的总导演，被当作为首分子，处处被推在最前面。自此，我们被大会斗，小会批，挂牌游街，劳改检查，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运动风向转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从黑帮身份解脱出来。四个月的经历终身难忘。

与此同时，我家也发生了重大变故。网上登过我写的《儿女祭》。它最早是1986年为了纪念我母亲遇难20周年写的，登载在刘年玲女士主编的《秋水》杂志19期。也曾在Linda女士主编的《波士顿新闻》2009年4月24日登载过。我母亲是个退休小学教师，1966年在红8月里被北京外馆中学红卫兵打死。我母亲被斗的更多详情我并不知道。但是最后火葬场卡车到第六人民医院拉我母亲尸体的经过，是我一人亲身经历的；我的哥哥姐姐都是30多年以后，在1999年，我写的《儿女祭》被收到国内出版的《思痛母亲》一书时，他们才看到，才知道。我父亲姚剑鸣在我母亲被打死后，被赶回原籍。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农机院专案组的恐吓、威逼下，他在安徽老家自缢身亡。他是黄埔五期毕业，曾长期出任国民党上校军官，后参加淮海战役廖运周110师起义。建国后，熬过了无数运动，但终究没有躲过文革这一关。我哥哥姚监复同样在运动里遭受残酷斗争，一只眼睛被打瞎，至今他仍活跃在思想战线上，戏称自己“一目了然”。

文革第一年我就挨了闷棍，自知家庭出身不好，故小心翼翼，远离运动。但是还是没有躲过。1970年，当“一打三反”运动展开后，抓“516”之风席卷全国。这次以打击“现行反革命”为主的运动，是继1966年红卫兵残酷迫害“黑五类”、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之后，第三次大规模残害群众的全国性运动。涉及到上千万人。我又一次被打成“516分子”。这次对我的摧残甚至比1966年运动初那次还要甚，一是时间长，二是斗争方式恐怖。当我怀孕6个月时，走进了“学习班”，那是专政的一种文明称呼，是一种比运动初大轰大嗡、疾风暴雨式的斗争更为恐怖、更残酷的斗争方式。你甚至不知道你究竟犯没犯罪，你又犯了什么罪，‘逼供信’使得事情模糊又确切；无影无踪又信誓旦旦。这是为什么这次运动自杀的人最多，受伤害的人也最多。可是最终竟然不了了之。荒谬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不是普通的人能想像和编造出来的。我的孩子诞生在当地县医院，人家九月怀胎，我是十月才进产房，按照紧急情况做了一次古典式剖腹产。产后继续办学习班，直到我几近崩溃，把我放到蔬菜班，一边劳动，一边继续交代问题。当同班的人去听内部报告或者进行政治学习时，我常独自劳动。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当我独自一人在那起伏的丘陵地，伸直了弯久了疲劳不堪的腰，抬起头来，望着远处泛光的池塘和葱绿的树木，薄雾轻轻飘过，似梦似幻般的感觉让我伫立良久。我突然感到大自然是多么美好，而我们所处的社会又是多么险恶丑陋。它们是那么地不协调，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但是当时我发誓，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要留下来，留给我的孩子，留给后代。

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是那时，我完全不知道，我该怎样把这些留下来，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让我的誓言实现。

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我怎么会选用‘长篇小说’方式来记录文革”

1972年，在周恩来指示下，二机部全部人马从干校撤回。我是湖北干校最后一批撤回的人。回到北京后，我作为‘516反革命分子’被安排到一个陌生组里，被监督劳动。虽然回北京，但是我的境况没有改变，我决心自己解放自己，自此我开始了我的独自一人的抗争。我给周恩来写信，把信送到中南海警卫手中。申述干校的种种荒唐和无法无天的行径。我的信竟然被转到了二机部领导手里，原来当时的二机部老领导，正和从空军来的军管会在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知道下面群众被整，但不知详情。不意我的信成了老领导对抗军管会的一个武器。但是当时运动还是十分复杂，问题短期无法解决；我决心不等平反，离开那里。经过三年的种种奋斗和努力，我在1975年，调到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这里似乎完全是另一个天地。也许运动已经到了后期，这里也有我的大学同学，这里的人知道我是著名的政治‘运动员’，文革中受到迫害，反而对我很友好。我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好的研究所，似乎也和我的专业对口，可惜新工作是设计一个要花几千万美金的高能设备，似乎有点好高骛远，事实上5年后也下马了，我的几年努力又一次付诸东流。我大学毕业已经十多年了，没有做什么业务工作，心中焦虑不已。我急于要做什么。那时我萌生一个念头，我要写一位科学家传记。

追溯其源，早在中学毕业时，爱好文学又爱好数学物理的我，决定报考刚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核物理。盼望以后当科学家，同时写科学家。多少年过去了，当科学家的梦想成了泡影，写科学家的愿望在20年后实现了。我刚回到早已生疏的物理领域，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决定用着墨较少的电影剧本形式来写传。我选择的科学家是李四光。他是文革中少数没有打倒的老科学家之一，是著名的、有成就的地质学家，也是科学院副院长；而且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李四光唯一的女儿李林，也在高能所工作。当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没几天，我就找到李林，我对她说：“我要写你爸，用的形式是电影剧本。”那个时代，尽管四人帮倒台，但是当时天还没有翻过来，没人敢为知识分子树碑立传，李林惊喜有人要写她的父亲，高高兴兴地把她母亲写的四万字回忆录借给我看。后来经过种种努力和波折，在电影界老前辈夏衍支持下，北京电影制片厂选用了这个本子，拍了这部影片，片名就是《李四光》。凌子风导演，孙道临主演，1979年公演。

第二年，有一天和几个高能所的同事聊天，他们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用写文革？你应该写文革！”那是1980年。他们跟我讲了每个人知道的文革中发生的故事，看见的，听到的，以及传说的。我想起了我死去十多年的父母；想起了10年前，我独自在湖北干校，站在高坡上望着起伏的丘陵，远处泛光的池塘和葱绿的树木，我曾对自己发过誓，要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留下来，记录下来。我牢记托尔斯泰说过：“仅仅不公开撒谎是不够的，还必须力求不从反面撒谎——默而不言。”我早就想“言”，可是那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言”，怎么记录下这些年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忽然明白了，我要写文革，这次我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写。我不会写我个人的自传，或家史，那样太狭窄了，太有限了，我要写的是整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众人的苦难，社会的疯狂，要把我的书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我不会去直接写历史书，也不想去写政论文章，但是我要用文学的形式来书写。我相信，文学能更深刻地把人的内心世界剖析，能说有些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无法说的话，能揭示人生的某些真相；还有，文学肩负着道德责任，可以做更多的价值判断。有些人们容易忘记的东西，文学却能够让人记住很久。你不仅要写事件，还要写背后的东西以及人的欲望和心理，要尽可能具体、生动和丰富。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个人与社会的幸福，是伟大作品的源泉。”我拥有前者，追求后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也不会忘记托尔斯泰说过：“艺术永恒，人生短暂，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我想做的正是这件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决议》。对文革基本予以否定。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接下来踏踏实实地追踪和研究，既没有搞清真相，更谈不上做真正的清算，当然也不会有公开的道歉，没有更深刻的反思与必要的和解。因为要做所有这些，必须触及到现有体制，会伤筋动骨。平反只能是表面上的，报上登载的必须是部级以上的干部。高层的许多干部，都做了足够的平反宣传，我们知道了刘少奇的最后日子，知道贺龙，彭德怀等被迫害的细节；而普通百姓，没有平反，没有道歉，更没有赔偿，他们也只有自认倒霉。文革批判随着时间的远去，渐渐变成了一个愈来愈难触及的话题。电影上出现文革就是戴高帽挨斗，和一群女红卫兵跳忠字舞。以致到了今天，有些年轻人说起文革，竟然指控那是老一代集体编造的谎言，甚至有人说批判文革是为了取悦洋人的卖国求荣的汉奸行为；北大学生被问及‘四人帮’，竟答道：“马恩列斯”。

也许看历史著作会感到冗长，看政论文章会觉得枯燥；那么好的文学作品也许可以弥补不足，就像很多人不是通过看历史著作了解法俄战争，而是通过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解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争，也了解了俄国社会；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知道更多那个时代的法国社会以及法国大革命。我不敢和这些大文豪相比，不过，我相信，我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将尽力向更好努力，这总没有什么不可以吧！

这就是我的出发点。我相信，人所以和动物不同，因为我们不仅有语言，还有文字，人类有反省的意识，有彻悟的魂灵，在人类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人类的文字、文化和艺术，是他独特的不朽之处。我们必须好好把握这个武器，充分利用它，历史学家和作家的神圣职责，就是要用笔记录下来我们走过的路程，要讲真话，这是很难的，因为必须要有真诚的心怀、真实的事实和坚实的真理。作为高贵的人类，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在大灾难之后，人类应该清醒。否则我们会像巴金说的那样：“第二次灾难，会使我们民族毁灭。”

可惜我一介小民，个人所知资料信息和上层斗争背景有限，文学和史学功底有限，时间和精力更加有限；自从1980年萌生写文革长篇小说念头，久久没有动笔。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两年多时间里，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另一个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我也通过这里的图书馆看到了许多国内看不到的书籍杂志和资料。特别是燕京图书馆有许多珍贵的书籍资料，看着那二十多卷红卫兵小报汇编，我砰然心动。那两年里，我看得很多，想得更多。我感到这里该是我最好的写作地方。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我作为中国科学院公派访问学者，1984年回去了。一去五年，当1989年我再度来到这个国家，尽管我没有忘记我的誓言和我的理想目标，可是我为了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存，从60、70年代在政治漩涡里翻滚，转战到90年代和新世纪在经济泥潭里挣扎，我梦想有一个安生的写作环境，但是从来没有过。尽管我没有提笔写，可是我一直在收集资料，在设计人物和构思情节。直到2005年我做了换膝盖手术，自知时不我待，心想在我心脏或大脑，或任何会损害我思考的器官出问题前，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否则此生死不瞑目。于是我奋然提起笔，把35年前的誓言，25年前给自己许下的愿，落实到了纸上。初稿写下85万字，后经多次修改，《似水流年》的实际字数是40万字，《悲情大地》的实际字数是47万字。我写的文革小说终于在我发誓要留给后人40年后，在我决定写文革小说30年后出版了。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最困难的一个题目，究竟该怎么写文革。

小说有很多类：历史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以及武侠小说等等。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小说或是文学类型，即“见证文学”。那是一些目击证人，为了给未来做见证，他们用笔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文学作品。从苏维埃时代的索尔仁尼琴，无数的犹太作家，以

及近年涌现的许多东欧作家。他们认为用笔记录下来他们经历的灾难，是自己的职责，是自赎，也是拯救。

我们国家有没有？也有，不过总有一点走音。甚至出现了一些让人不安的东西。这些年盛行写传，自传或他人执笔写传，叫做“回忆录”。其中明显有溢美弃恶的现象。只写自己做的好事，详尽地写受难的部分；可是以往整人的事，做过头的事，全没了。有的完全是官方修史，有的领导人的回忆录班子达几十人之多。当权力掩盖了真相，那些即使是离发生事件并不太遥远的史实，都会被扭曲。不要说后代，就连当代人也会被蒙蔽、被欺骗。所以有人说，“正史不一定是信史，野史也不一定就不是信史。”

相对于他们，另有几类人值得注意，一种是受难人自己出面写受难史，可惜他们写的东西不一定能出版。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是由当年右派分子铁流主编的《往事微痕》，另一个是焦国标主编的《黑五类忆旧》。这些作品内容真实、翔实。当事人忠实地记录下自己或家人的受害、受难经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和刊物，国内竟然不允许公开出版发行。它们完全由一群老右派、老黑五类或是他们的子女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发行。连通过邮局邮寄都受到重重阻碍。有幸西方很多大学都在收集这两套书，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见证。

另有一些人，他们书写和记录了文革以及这些年在中国发生的各类灾难。他们本人或许并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或不是直接受害者，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有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生命的敬畏，他们是值得钦佩和尊重的。其中有父亲饿死在大跃进年代的杨继绳写的《墓碑》，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以及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等。《文革受难者》被余英时称为“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这是写普通老百姓的苦难史，作者凭一人之力，收集了659个文革红八月死难者的真实史实，针对官方修史的遮掩与回避，这种作品正如余英时所说：“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良药。”还有许多人，如宋永毅等对文革历史做了难能可贵的工作。

当然时下也有一些作家笔下出现文革片断。八十年代出现的“伤痕文学”曾经让许久没有看到真实写照的老百姓感动得流泪。但是，那时的作品，多是局限在有限范围内，不敢深究，回避细节。那些作品笼罩在一个荒谬的哲学下，即“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不应记恨母亲”。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见证文学远远落后于前苏联、东欧和犹太人。我们有些名作家写文革，或是蜻蜓点水，或是荒诞调侃，有位名作家在他的小说中，称文革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大联欢，是毛泽东诗意盎然的狂想曲。”这种写文革的手法让人感到遗憾和无奈。

当我们把对文革的判断只停留在“一场浩劫”、“彻底否定”这些表面词句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就变成了替罪羊。从没有引申到制造浩劫的机制，以及极权统治中的个人责任和参与者的人性等深层去探讨。对当初卷进这场运动，多多少少做过恶的无数普通人，既要看到当时国家权力的容忍与怂恿，领袖的魅力乃至诱惑；也要看到个人道德价值判断的失误，失去了道德底线后的疯狂。事实上，当一个人知道可以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不能笼统地把责任转移掉。当然我们并不提倡人人做忏悔——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一位被长辈称为“当年善良正派的15岁女孩”，在几十年后，承认自己当年打过人，并冠冕堂皇地说：“打人成了咱们‘革命的成人礼’”。

但是国家应该担当起政治罪责。这种在和平环境中出现的群体灭绝罪，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有人选择遗忘，但是终究有一些人会永不忘却。记住，在绝望中求希望，在黑暗中盼光明，是千百年来人类的生存法则，这是人类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仍然伫立在地球上的原因。我们是地球上人类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打着什么旗号，总不至于自甘堕落到拒绝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吧。

今天我们提笔写文革，是基于记忆，也忠实于记忆；另一方面则基于一种道德追求，和终极关怀。我们必须用微弱的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统治者的谎言、官方的权力的谎言。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程，需要许许多多的人一起来做，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来做。不过我们记住，正义社会总是向受难者、向弱者倾斜，当然前提是正义要在你的国土占上风，不然这种倾斜可能相反。其实指认罪行和宽恕和解并不矛盾，只要犯罪者在良心上真诚悔过；这对某些社会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不过无论如何，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可贵的先例给了我们一点希望。我们看到在西德，在南非，在台湾，经过几十年后，都出现了这种和解。美国这些年，先后在1988年对二战时日裔人道歉和赔偿；1993年对夏威夷土著道歉；2009年对黑奴制度向非裔道歉，2010年5月向印第安人的不公正道歉。2011年1月19日，华裔议员赵美心表示要争取对1882年排华法案正式道歉。我们拭目以待。

不知中国人是否也要等到百年后，才能听到一声道歉。

对文革的思考还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们对当世社会风气低下的焦虑。这和我们前面谈到的文革有许多普通人卷入相关联。如果我们只盼社会制度变革，而人心不变，恐怕到头来等待我们的是一场更大的悲剧。致力于极权主义研究的汉娜·阿伦特说过：“极权主义依靠的是纯粹多数的力量”。德国人曾经担忧：“对道德责任的漠视，是纳粹大屠杀还会重演的重要因素。”这还是德国人说的话，他们已经为自己前辈的罪孽做了足够的忏悔、道歉和赔偿；可是他们仍然在不断召唤人类的同情心、羞耻心和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呢？

2004年3月25日，俄国发行了两张光盘，记录了130万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资料。每年犹太人纪念大屠杀的日子，哈佛大学的犹太学生，都会在哈佛最大的崑德勒图书馆前，轮流朗读二次大战中数百万犹太遇难者的名字，一连几天。

住在波士顿的我们，大家也许都去看过，波士顿热闹的Quincy Market北面，有6个高达54英尺的透明玻璃方柱。那是新英格兰纳粹大屠杀纪念碑。那6个高高的空心玻璃柱代表了6个主要的纳粹灭绝营和集中营，玻璃板上刻着六百万受难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的囚号。他们的名字埋在每个柱子下面的方穴里。在一侧的石碑上，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著名警句：

“起初纳粹追杀共产党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仍然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向我奔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是写于二战后的1945年。它对德国的道德重建起了极大影响，今天也被世界各色人种，为了各种目的引用和传播。许多人到波士顿来，不仅想看河对岸的哈佛大学和MIT，他们也想看看伫立在市政大楼后不远处的六个高高的玻璃方柱，以及马丁&#8226;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警句，它几乎成了这座大屠杀纪念碑的铭文了。

中国该建多少这种纪念碑、纪念塔、纪念馆？寥寥无几，相信早晚会出现。

前两年海地地震后，引起世界关注，为什么这个社会那么没有自救能力。一位30岁的海地小学女教师，说出了一番看似平凡，实为深刻的话。她说：“我们要从基层、草根性上改造，否则再过300年，再多外援，我们还是站不起来。”这番话对我们同样重要。这也是有些人称

我们社会急需“公民教育”，或是“重建社会和伦理”的观念。也许中国还要等若干年后，才能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说清楚；才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懂得感恩，懂得敬畏，懂得宽容；也能分辨善恶、分辨是非、分辨黑白的人。不管我们看得到还是看不到，我们所作的每一点努力，都会为这个艰难历程助一把力，也许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吧。

我讲了为什么写《悲情大地》的心路历程，由于我不是专业作家，按照艺术标准要求，这本小说肯定有不少地方值得推敲；我也不是史学家、哲学家，对文革的深层次的探讨与反思不可能深刻和全面。我愿意倾听各种批评意见。

对于文革本身及其后遗症值得深入研究。为什么现在中国又出现了肯定文革、甚至号召第二次文革的不祥声音？是否是由于改革中出现了权贵阶层和官僚利益为核心的体制，不受约束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垄断了经济、政治、思想资源，不公正、不平等的分配方式等等。文革中特权政治已经转变成了特权经济。最危险的是中国文化转型走向，在金钱和暴力面前又一次迷失了方向。大陆杀害幼儿、家人的骇人听闻的案例，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红八月大兴县杀害地主灭族，包括幼儿的暴行。这些问题是不是文革的后遗症和留下的畸形儿。究竟以什么方式缓解现实存在的严重问题等等中国难题，值得深思。对文革，我将继续研究和思考；也希望更多的人一起来研究和思考；我写此书，也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那些经历过这场旷世难有的历史的人们，一起提笔来写，来记录这段历史。

最后感谢张凤女士，感谢哈佛大学和哈佛文化作坊，感谢听众们和读者们！

2011年3月4日 哈佛文化作坊

□ 原载《观察》

~~~~~

## 【往事追忆】

### 我的阅读与思考

• 赵京兴 •

（赵京兴，北京四中六六届初三（三）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年初因文字入狱，关了三年。一九七三年先做临时工，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市一轻局工程处当工人。自一九八零起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任编辑，自一九八六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研究员。）

### ◇ 引子

“文革”十年，我基本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度过的，包括坐班房那三年，虽然只能阅读毛选，我思考的时间反倒更多了。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有时“玄想”的成分更重了。有一次“队长”（犯人对看守警察的称呼）把我叫到“小号”（关押重犯的单人牢房），问我是不是又散布什么唯心主义言论了。我回答说没有。队长提醒我“馒头”二字，我一下子想了起来。

头一天上午正赶上每周伙食改善。每天两顿饭，上午九点半，下午四点，由“劳动号”分送到牢房。为落实毛主席把犯人当人看的人道主义指示，“队长”宣布，每周改善一次伙食：除了照例每餐一碗汤菜外，馒头代替了窝头。每到这一刻，总会引起一阵莫名的激动，本不准随便说话，馒头一到手，大家话就特别多。

大家正欣赏那白白嫩嫩的馒头，我和另一个“政治犯”开始讨论一个问题：馒头掰开前里面是否有颜色。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陈伯达，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认为，馒头掰开前里面是无所谓颜色的，颜色是光与物质作用后留给我们的视觉印象，而馒头掰开前见不到光，虽说具备反射全波段可见光的属性。我罪加一等：宣扬唯心主义，这回和马赫挂上了钩。

## 一、为什么读书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六岁，在北京四中读初三。在我看来，“文革”似乎有一种必然性。“要末在沉默中爆发，要末在沉默中死亡”，如果把其中的“沉默”改为“沉闷”，就更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在“文革”前几个月的日记中，我用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概括我的深切感受——我们将面临的是一场时代的疾风骤雨，甚至已听到遥远地平线上的滚滚雷声。在同一篇日记中，我用高尔基《海燕》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结束。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如今回头来看那段历史，正是学校教育的危机触发了一个少年学子的内心矛盾，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终于走上一条不归路。

按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四中一大特点就是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父辈包括部长、将军，教授、工程师，甚至国家领导人。要说绝大多数很低调，很平民化，但不经意的一举一动却透出生活的富裕与优越——他们显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等级。而我，父母都是工人，每月收入加在一起才一百零八元（这在他们厂已算高工资了，他们以此感到自豪），要供养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吃饭穿衣，特别是按时缴学杂费书本费，还是紧巴巴的。他们不是政治口号中那种正儿八经的工人阶级，公私合营前靠小裁缝铺糊口谋生，合作化后进了工厂，成分只是“独立劳动者”而已。与许多同学的家庭相比，我家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差了一大截，除了下意识的自卑外，也让我深感困惑。

还有一件更让我痛苦的事。当时在学校，对人生观教育抓得非常紧，不仅老师上课下讲，还让我们读了大量《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一类的书——不仅是完美无瑕、高尚的一生，还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让我感到绝望的是，按此人生标准，这辈子看来都无法企及。我往往既是自己的心灵拷问者，又是被拷问者。内心折磨得支离破碎，为自己乱七八糟的想法而羞愧，甚至恐惧。

无人可请教，更不敢问老师。在“文革”前不久的一次政治课上，我问政治老师“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老师一脸茫然。要不是他素知我这个人常有古怪念头的話，我很可能会被打入反动学生的行列——居然敢质疑这样普通的政治常识。

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读书，读文学、读哲学。我在初二读过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希望从中找到答案，可书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思想无出路的苦闷与循规蹈矩的课堂生活的反差，让我备受煎熬。“文革”终于爆发了，它首先宣称砸碎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让我获得某种解放感——至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寻找答案，不必再照本宣科了。毛主席的内部讲话在同学中流传，他鼓励青年人看点“封资修”，要“钻进去再爬出来”，这对我鼓舞很大。虽说在我从未在阅读上设限，但有了“尚方宝剑”，我可以堂而皇之把托尔斯泰《复活》摆在晚自习课桌上，没人敢说三道四。



某些书让我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倒不是书中有什么现成的答案，而是那些作者的处境跟我差不多——在思想的泥潭中挣扎，我引为知己。从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费尔巴哈、黑格尔和康德，我在他们的书中读到别人读不到的东西。即使艰深晦涩如黑格尔、康德，写的其实都是个人的思想历程。有一次赵振开（北岛）问我，听说你读哲学就像读小说。我不记得是怎样回答的了。但我确实觉得二者没什么区别，《精神现象学》是另一种形式的小说，只不过是哲学概念讲述的个人故事。

## 二、《出身论》与遇罗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大串联”已接近尾声，我和几位同学组成长征队，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徒步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翻越太行山，穿过山西，进入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最后到达延安。“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解开了我脑袋里的种种谜团。在我看来，认识世界是需要“眼睛”的，否则除了现象，你不可能发现背后的意义。所谓“眼睛”，指的是主观认识客观的能力。事实本身不会说话，认识既来自客观也来自主观的认识能力。这是我在那一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后来我在《哲学批判》中做了系统阐述。

一九六七年年年初，我们从延安回到北京。在一份《中学文革报》上，我读到《出身论》，当即写了大字报，署名“牛虻”，支持《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主办这份报纸的是“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实背后就那么几号人。头头是我校高二（二）的牟志京。我和刘力前、刘新等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队，支持《中学文革报》。

有人通知我说，“老红卫兵”要在北兵马司胡同举办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我和刘力前等人前去应战。据说那是叶子龙的住宅，被没收后成了“老红卫兵”总部。会议室很大，能容下五六十人，挤得满满的。作为主辩方，我们坐在长桌的尽头，辩论对手围坐在桌子四周，后面站满人群。当时我并不知道遇罗克也在场，他在窗外观看。

在辩论会上我说过什么，早就不记得了。作为主辩手，我临场发挥不错——思维敏捷，引经据典，外加一摞马列毛经典著作在桌上压阵。我方显然占压倒优势。这引起遇罗克的注意，他随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四中。但他把名字误写成“赵金星”，正好我校有个高一的同学叫这名字，信先到他那儿，辗转了一个多月，才落到我手中。

遇罗克在信中以鲁迅为例，讲述了伟人的悲剧命运——往往被后人利用，失去他们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显然是对当时极左派对马列思想歪曲滥用的不满。结尾处，他邀请我去他家一叙。

就在不久前，由于某些同学家长得知遇罗克的家庭背景出面干涉，“红旗”战斗队集体退出《中学文革报》的活动。对此，我深不以为然，还是如约去了他家。

他住在山墙与院墙的夹道中搭建的小屋里，除了床，还有写字用的小桌，墙上有两层木板的简易书架，放着哲学、历史、文艺理论书籍，其中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正在找这本书，他借给了我。没想到这书和它的主人命途多舛——书从我家被抄走，遇罗克和我锒铛入狱，他不幸蒙难，书再也没回到主人身边，恐怕早已成了纸浆。

遇罗克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谈锋犀利，阅读范围广。在我们交谈中几乎未涉及《出身论》一文，我相信《出身论》只是他思想中极小的部分。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辩论。他当时是工人，按今天的标准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嘴唇很薄，用词犀利，咄咄逼人，激发了我辩论的热情。我们享受着思想交锋与词语撞击的快感。

我还参加过由遇罗克发起的一次郊游，参加者多是中学生。我们一起骑车去爬香山。他那年二十五六岁，似乎还没有女朋友。他是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兴致勃勃，爬山时总是走在众人前头。

一九七零年三月，我在狱中得悉他的死讯。同号们都认为我离这一步也不远了，在批斗中，我的罪名之一就是与《出身论》和遇罗克的关系。而我们这些支持过《出身论》的中学同学都逃过这一劫。据说与戚本禹有关，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讲话中表示，对涉案《出身论》的中学生概不追究。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出身论》对特权势力造成建国来从未有过的冲击。其实，出身只不过是特权势力把持特权的一张牌，据我所知，至今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解读《出身论》。相反，人们往往把悲剧解释成闹剧。遇罗克几次临刑前宣称有重大问题交待揭发，以期延缓刑期等待转机。不少人解释为遇罗克惯有的机智，使之看上去如同闹剧。在我看来，他一定怀有真诚的信念，相信自己的行为与“文革”发起者的动机是一致的——矛头指向特权势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可以说，一代人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特权势力，否则改革开放不会那么顺利，但真正对中国特权势力造成冲击的不是“文革”，而是改革开放。在引入市场机制后，金钱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地打击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特权势力。但在那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探索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恐怕就是悲剧的根源。

### 三、北京图书馆

一九六七年年中到一九六七年底，正当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北京图书馆对外开放了。除了被列入淫秽图书如《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文学作品外，一律敞开阅览。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恐怕难以置信。

那一段时间我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我带上干粮，来到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大门外排队。为了确保每天都能进去（每天只发两百多个座位号），并继续借到头天没读完的书，唯一的办法就是早去。最难熬的是冬天，在严寒中站上两三个小时是一种考验。北京图书馆就在中国南海北门对面，那里日夜有人站岗放哨。警卫战士对与这些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学生很是好奇，最初常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史哲书籍，还结交了各路朋友——交流思想，分享读书的喜悦。而北京图书馆最后关闭像开放那样突然，那些朋友大多不知去向，后来保持来往的只有林大中、林大庆兄弟俩。林大中长期我几岁，那时是北京摩托车厂技术员，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文艺批评，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很有研究。林大庆小我几岁，借阅的主要是乐谱和俄罗斯文学，他长得如我想象中的《白痴》里的梅茨金公爵，后来进电影学院，最终成了电影导演。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关于中国阶级划分问题的讨论。

当时都自带干粮，图书馆提供白开水。一到中午，大家就聚在大厅或楼梯拐角处，边吃边聊。一天，我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同学聊起马蒂厄的《法国大革命史》。他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只有官民两个阶级。那时我倾向于用社会力量来描述中国不同的社会集团，认为用阶级这概念已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的社会结构。即使用阶级概念，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结构仅仅分为官民两大阶级似乎过于简单化。尽管如此，这一观点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多年。后来我的研究结果证明，对于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来说，它离真理的门槛最近。

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图书馆关闭了，我的读书生活并未中断。我常常泡在旧书店；或在废品收购站，从别人手里买下当废纸处理的旧书；或与同学互通有无，他们几乎个个都是书痴。

为了写这篇回忆文字，我特别翻阅了近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中国国家图书馆大事记（1909—2009）》，发现对“文革”期间北京图书馆开放一事要么一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我猜想，这些书的编著者实在无法解释，在一个“焚书坑儒”的年代，为什么北京图书馆还会对外开放？

#### 四、大字报与隔离审查

从“文革”爆发到一九六九年初，我总共写过三张大字报。第一张是我和同班同学刘力前一起写的一份声明，缘由很简单。刘力前的父亲是全国总工会的普通干部，我父亲是“独立劳动者”，都不算红五类，也非黑五类，我们认为剥夺我们参加“大串联”的权利违背毛泽东思想，按当时的逻辑就是“造反有理”。我们俩说干就干，光天化日之下撬开那间代表权力的办公室，取出公章，一连盖了好几张外出证明信。这势必招来红卫兵组织的质问和围攻。为说明我们行动的合理性，我奋笔疾书，写了这张大字报。这是我“文革”中唯一一次造反行动。随着读书兴趣日益浓厚，我参与社会实践的冲动越来越小，或者说读书就是我最热爱的实践。

第二张就是上面提到的支持《出身论》的大字报。第三张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时间应在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发表不久，即一九六八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初，为了申明我不参加上山下乡的理由。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张大字报的题目也过于胆大妄为了：不仅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还敢公然与学校工宣队叫板。由于熟读毛主席著作，用起来得心应手，我首先从概念上阐述毛主席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含义，然后引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按照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有三种形式，一是走马看花，二是下马看花，三是安家落户。我在大字报中写道，即便是安家落户，也不是你们所说的上山下乡——纯粹为解决就业问题。而我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走马看花、下马看花照样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爱抠字眼，注重如何正确理解经典作家所用的概念，尤其对“文革”中流传的毛主席指示，我认为这也是他一贯倡导的学习方法。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就特别强调过“党内共同语言”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是下面的人不了解毛主席的语言，歪曲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自认为真理在握，更加理直气壮。

本来“工宣队”对我整天捧着《资本论》而不学毛主席著作就极不满意，质问我“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却要读‘资本’论”。这张大字报正好提供了借口，正赶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们把我抓进学校，隔离审查。那是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关押在四中音乐教室小院。自“八一八”以来，那里一直关押着“牛鬼蛇神”，后来都是所谓有问题的老师。我被关进去时，廖锡瑞老师还关在那儿。和我前后关押的还有黄其煦和史康成，还有其他人，名字都记不住了。

那时廖老师似乎刚满四十，在我们眼里已是学富五车的老先生了。他是我们班语文老师，总能带来某些课堂以外的新知识，比如“莱塞”（激光）。让我记忆犹新。我们亲热地称呼他廖先生。在关押期间，他的房间就在对面，每天他总是低着头被几个学生带去劳动，却没有机会打声招呼。改革开放后，廖老师连续三年带出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后来在北京办了所高考复读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前几年，我们班部分同学还为他庆贺了八十大寿。

我和大康（史康成）那时还不太熟，只记得他有一次用暗语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黄其煦是初三（一）班的，因为鼓捣无线电发报机，被派出所所以“特嫌”之名送到学校，他和我同年

级，时不时能聊上几句。掌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组织了几次我的批斗会，除了针对那张关于上山下乡的大字报，以及我的日记片断，再就是我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提纲。幸好阴错阳差，批斗我的人尚不知《哲学批判》的存在。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写在《哲学批判》之后，手稿早已遗失。我能记起的主要观点有，一是农业的社会化问题，以及社会化必将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这在我的《哲学批判》中有所反映；二是关于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我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工农业之间缺少社会化的联系，从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社会主义要想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就必须实现包括农业和工农业关系在内的生产社会化。农业社会化主要是因地制宜基础上的分工，而发展商品经济是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银行的作用是对整个社会资金进行管理，从而在资源分配上发挥核心作用。我后来报考研究生时选择货币银行学专业显然与此有密切关系。今天，从一名职业经济学工作者的眼光来看，这一想法与其说是研究结论倒不如说是猜测更恰当，它来自于我对历史逻辑的认知，既缺少严密的经济理论基础也缺少经验材料的支撑。

批斗我的人认为提出这些观点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没说过。为了自我辩护，我只能说，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这下更是罪加一等，因为触犯了林彪的“顶峰论”。

对“工宣队”的种种作法，我认为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原则，故决定上告。

被关押近一个月时，我趁上厕所的机会逃跑了。厕所紧挨着院墙，由于院墙很高，几个看押的学生放松了警惕。我经常练单杠，一个引体向上就轻而易举翻了过去。我一路狂跑，找同学借了点儿钱，冲向永定门火车站，搭火车直奔白洋淀。

上山下乡早在一九六七年底就开始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大部分同学已在学校安排下去东北、内蒙、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或山西、陕西的农村，剩下的少数人自找门路。有两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一个是东北的莫里达瓦，一个就是河北的白洋淀。这两地不仅收入高，且风景优美适于生存，一个是草原牧区，一个是北方的鱼米之乡。北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等校的同学，于一九六八年陆陆续续到白洋淀安家落户。其中有我的女友陶洛诵。这里后来还出了一批诗人，像多多、芒克、根子。

陶洛诵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也是《中学文革报》的一员，我是在卖报时认识她的。由于顶不住校方和街道的压力，一九六八年底她和几个女附中同学来到白洋淀插队。我曾在这儿住过几天，和当地老乡的关系不错，也算是“下马看花”。逃脱后，我自然首先想到白洋淀。

陶洛诵住在名叫邸庄的小岛上，那是个仅有几百户的渔村。在这儿插队的还有的三个女附中同学，后来她弟弟和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也来了。一度招来不少北京的地下诗人和画家，留下足迹。

话说回来。我一到白洋淀，立刻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申诉信，又返回北京把信寄到中南海。我住在同学家，既没钱又没换洗衣服，只好打电话找我弟弟，我弟弟告诉了我父亲。他是过来人，知道逃跑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把我送回学校。不过没多久“工宣队”就把我放了，估计是申诉信起了作用。“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时说，四中再有两个像我这样的，他们就得卷铺盖滚蛋。这里的“得”是老北京话，发“děi”的音，意思是“不得不”。

这次虽把我放了，但还是埋下了祸根。没过一年，“工宣队”找了个碴儿，把我直接送进了

公安局。

## 五、《哲学批判》与牢狱之灾

我对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初二就看过我大姐上中专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读本。我也喜欢文学，尤其偏爱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鲁迅等带哲理性的作品。在北京图书馆读书后期，我系统地阅读了西方古典哲学的译作，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加上更早的培根、洛克、贝克莱，以及古希腊哲学家的篇章；当然还有马克思（包括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罗汉诺夫。为吃透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我用很长时间钻研《资本论》。

通过阅读，我对哲学有了独立见解，并提出自己的哲学命题。我有抄书的习惯，把我喜欢或认为重要的文字大段大段抄在笔记本上，并每天写日记，整理一天的思想。有一阵，我为自由与必然这对哲学概念着迷，它们在辩证法中居于特殊位置。每天夜深人静，我进入沉思默想的特殊状态。有一天我用日记的形式整理自己的思想时，一个命题“人的本质就是对必然争取自由”脱颖而出，没有逻辑推理，突如其来，就像闪电照亮大海。那一刻甚至伴随着生理上的亢奋，对我来说是难忘的精神历程。

上述命题成了我的《哲学批判》的核心命题。

按今天的眼光，《哲学批判》只能算是一篇不到十万字的论文，而我却是按哲学专著的形式处理的，分成上下两卷，外加一篇序言。上卷为“哲学的认识”，包括“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两章；下卷为“哲学史”。全书是按对立统一的辩证结构铺排的。我认为，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真正的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只是从现代开始的。“哲学史”的两章分别论述了我认为是现代哲学代表的英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已不属传统哲学范畴，并未专门论及，于是另辟“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与人本主义哲学”的附录。

之所以称为《哲学批判》，主要是在我看来，认识论哲学最终必然演变为入学，即以人的活动（实践）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则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顶峰。而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哲学，实现了研究对象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传统哲学，即使是认识论哲学，实际上已被扬弃了。这里批判一词的潜在含义是“终结”，模仿《资本论》副标题的用法——政治经济学批判，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诞生，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终结。

认识既然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合理解释，那么进一步要研究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这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西方古典哲学内涵的发展方向，在“哲学史”部分我试图发掘的就是这一内在逻辑。

在“哲学原理”部分，我首先把哲学定义为“是研究人的活动规律（或者说人的本质）的科学”，再进一步把人的活动（实践）规律归结为必然向自由的转化。这是一个分析综合的过程，概念与认识正是通过这种分析综合获得的。实践就像眼耳鼻舌（医学上称为分析器官）一样，同样是人的“分析器官”。这是《哲学批判》的核心思想，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并说明其创新之处及在哲学中的意义。这是我最珍视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我的哲学专业的部分。

《哲学批判》的写作始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每天写几百或上千字，至十月底才完成。这刚好是我预定的时间——我准备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陶洛诵。用一本哲学著作作生日礼物，一是浪漫，二是把我的心得与她分享，尤其她正处在对人生对社会无限困惑与迷惘的阶段。按马

雅可夫斯基诗歌的阶梯式，我在扉页写下：献给我亲爱的朋友不倦的真理探索者陶洛诵。

陶洛诵把《哲学批判》借给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她们似乎对“历史哲学”部分更感兴趣，恐怕因为包括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把人类历史归结为劳动史，从劳动引出分工，再由分工引出阶级，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改造，需要“用商品经济来打破农业个体的自给自足生产的桎梏”，从而使农业像工业那样实现社会化生产。只有如此，人类才能进入到一个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

这正是陶洛诵的理想。她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文革”一直被批斗，她对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感到厌恶。我想告诉她的是，不理想的现实是某些人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历史长河中，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其实这部分是受逻辑与灵感支配，涉及现实的思想完全脱离现实，不仅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纯属异想天开，在结尾处展现的未来社会更是遥不可及：“整个人类劳动将用强大的工具体系为自己与自然建下巨大的屏障，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劳动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把它刻成蜡板油印出来，谁想到闯下了大祸。当时公安部门正在追查一份油印的反革命传单，首先追查油印机、蜡板等设备材料的来源。那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如惊弓之鸟，试图把油印机从学校转移出去。她们用塑料布包住油印机，送到余永定（他曾是四中的学生）的家。多年后，我在社科院再见到余永定，才知道故事原委，为此他还受到牵连。这一神秘举动难逃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的眼睛，很快就报告了公安局。由于没有经验，那几位女同学又把蜡板扔进插队所在地附近的井里。对此我一无所知。

一九七零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和陶洛诵在我姐姐家刚吃完饭，突然一帮我们学校的人闯进来，把我带走。到四中不久，来了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把我铐起来，塞进轿车。

到西城区公安分局已深夜十二点多。搜身登记随身物品后，警察把我带到一间木栅栏监房，那小门弯腰才能进去。犯人分两排躺在木地板上，头冲墙，脚对脚。后来才知道，这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虎笼式牢房。犯人们被惊醒了，纷纷坐起来，为我腾出地方，我终于靠墙坐下。没过多久，第一次提审开始了。那是个高大壮实的警察，提审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称费尔巴哈为唯心主义，我纠正他说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我还引用了宪法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自己辩护。这让他极为震怒，没几分钟就把我押回监房，上了背铐。一戴就是半年，除了上厕所，吃饭睡觉都不打开。

第二天上午，我听到陶洛诵的声音，她在院里大声向队长提出什么要求，显然是告诉我，她也在这里。出狱后才知道，公安局本来并没打算抓她，而她坚持“不论到哪儿”都要和我在一起，结果作为同案犯也被关进来。

和我关在一起的几乎都是所谓政治犯，虽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没有这个字眼。犯人自然而然被分成两类：刑事犯和政治犯。我有大约十多个同号，包括前西城公安分局局长，北京医学院大学生，女六中语文老师，其他几位也都因思想或言论而获罪，只有一个所谓“老炮”（即长期关押的老犯人），是国民党军政人员，解放后被捕入狱，“文革”中趁乱从劳改农场跑出来，再次被捕后暂时羁押在这里。

刚入狱那几个月，社会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运动正轰轰烈烈，几乎每天都把我拉出去批斗。从四中开始，向四周延伸，几乎遍及西城所有的中学。每次批斗，都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上有背铐，下有脚镣。我昂首挺胸走在校园里，与其说是被批斗的反革命，倒不如说更像被押往刑场的共产党。我成了活靶子，只要社会上的运动流行什么罪名，

肯定都安在我头上。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架着我胳膊，低头弯腰，汗珠子往下淌，也只能听之任之。其实我也不想辩驳，麻木如道具，似乎那是别的什么人不是我。我相信，我的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迟早会被释放并得到平反。

再往后的故事，超出本书限定的时间范围，为了给读者个交代，还是简单说几句。在西城分局关押了三年，仅提审三次。据说，起初不相信一个十八岁中学生能写出《哲学批判》这样引经据典、自成体系的长篇巨作，上面指示一定要查出背后的黑后台，花了大量的人力进行外调而一无所获，于是送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专家审查只得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结论（这可能是当时最善意的“罪名”）。一九七二年年末，离新年仅隔一天，我终于被释放了。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在当时是常用的说法。除此结论，实际上还有一个内部结论，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但因此我被剥夺一九七八年第一次报考研究生的考试资格。直到一九七九年六月，我才接到西城分局书面的平反通知，肯定了我写《哲学批判》的大方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遇罗克已平反，参与《出身论》不再构成问题；关于那张大字报，由于知青已大批回城，上山下乡是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已得到社会公认。他们还把没收的《哲学批判》手稿还给我，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的手稿则遗失。

陶洛诵早我半年出狱，重返白洋淀插队，在小渔村做民办教师。我出狱后做临时工，空余时间重操旧业——阅读与思考，只不过改变了阅读方向，从哲学转向经济学。促使我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看到周边的工人、农民是多么渴望过上好日子——白洋淀农民为住上新房，顶着烈日，围海造田般用河泥筑成一块块宅基地；北京家庭主妇把劳保手套拆成线，再一针一针钩成装饰窗户桌面的针织品。此情此景，常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 原载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

## 【书刊评论】

历史是失败者写的——《邱会作回忆录》阅读漫记

• 吴国光 •

林彪麾下的将军们正在他们所面对的最后一场战役中节节取胜；读了本书与《吴法宪回忆录》等，历史就打开一道天窗，那些使用下流手段获得政治胜利的帝王们所编纂的煌煌历史，在失败者的笔下一缕缕云散烟消。

### 一、历史是失败者写的

这是一本厚重的书——这不仅仅是指其篇幅而言。上下两册，998页，篇幅当然也很厚重了。更为厚重的，是其中所记载的历史，是历史所给予的启示。

本书作者邱会作将军，是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一九七一年九月被捕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当时中国形同全国半军管之中，军队权力势倾天下，军委办事组“有‘临时军政府’的派头”（本书页551），而总后勤部——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小国务院”。作者身处“文革”高峰时代的权力核心，固然深知诸多历史内幕；转瞬却又成为昨天同志们的阶下之囚，政治的波峰浪谷促人深思。更重要的是，作者自感冤屈，于是倾其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著作本书，旨在厘清历史真相——这之中的块垒与沉重，那是不难想象的。

急于辩冤这一点，当然可能成为局限。但是，如果真有所谓历史的法庭，那么，至少在当代中国，政治失败者们的呈词，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来看，是远远比那些“胜者王侯”辈的官修历史要坦白、真实、详细、公正得多。后者，不说充满了伪造、隐瞒、扭曲和谎言，至少也比皆是粉饰、虚言、矫揉和偏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失败者写的。从国共之争，到反右、文革、“六四”，是这样，失败者比胜利者更为忠实、详尽地记载下了血泪历史；从张国焘、郑超麟，到李锐、赵紫阳，也是这样，阶下囚比座上王远有还原真相、直面历史的勇气和能力。单就所谓“林彪事件”而言，早几年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其历史价值，比什么《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都不知要远远高出多少倍。后者不是垃圾，仅仅是因为历史没有垃圾桶。

《邱会作回忆录》，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政治失败者所撰写的历史记录。与《吴法宪回忆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等书一起，林彪麾下的将军们正在他们所面对的最后一场战役中节节取胜。这场战役，叫做“还原历史”；其所面对的敌人，就是专制者，就是政治上胜利了的专制者，就是依靠这种胜利中获得的政治权力而肆意践踏历史本来面目、意图垄断一切历史秘密的专制者。在这场战役中，凡是不甘为“历史”的某种垄断版本所愚弄、凡是意图探寻历史本来的复杂面目的人，不管其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派系归属、价值取向为何，都是专制者的天敌。谎言成就专制，空话强化专制，垄断等于专制。一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无力战胜谎言、空话、权力垄断和政治专制，也许有它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或许不乏让人同情之处；然而，如果这是一个有人类社会中最为源远流长的文字历史的民族，现在在现实生活中却连历史也为权力所垄断而充满了谎言和空话，那么这个民族恐怕就一定是无可救药了。中国还不是这样一个民族，因为失败者们所撰写的历史正在打破垄断、戳破谎言——不管是民间的失败者还是朝廷的失败者。

## 二、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真实的力量源于细节。胜利者们的官修历史往往充满了大话、空话，这样的“历史”只是一个气球。

《邱会作回忆录》不是气球；它是一件刺绣品。任何一部回忆或历史，都不可能没有选择和加工；选择什么和如何加工，决定这部回忆和历史的价值。“气球历史”选择“充气”，加工成庞然大物，但却一戳就破；“刺绣品历史”选择各色彩线，加工成一定的图案——但是读者并不必跟着作者的图案脉络去理解历史，我们可以研究每一根彩线、每一个针脚来寻找可能的历史真实。我所谓的细节，既包括作者所记述的历史细节本身，也包括从细节上看作者如何记述——前者是“彩线”的选择问题，后者是加工的“针脚”问题，

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当然首推关于文革初期高层政治的材料，特别是有关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之间的互动关系。书中记述，周恩来告诉“九大”之后新进入政治局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军队领导人：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页680）。很有意思的是，作者以很多细节来表现了这些关系。比如说，一九六八年夏天一次开会的时候，江青嫌开水热，摔了茶杯，骂服务员——这件事情不少回忆录都写到了，而当汪东兴叫护士重新端来一杯水后，下面的这个细节就只有邱会作记下了：“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并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页579）又比如说，作者记道：人民大会堂里有一个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开会休息时，吴法宪和姚文元都去抢这个地方，吴法宪虽胖，速度远比姚文元快，“我们”抢到了这个地方，江青、张春桥他们就不



去了；如果姚文元抢到这个地方，也只有江青、张春桥过去，其他人都不过去，“起来伸伸懒腰就原地休息”（页583）——这个细节把林派人马与江青人马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很生动。还有，庐山会议上，张春桥给邱会作让烟（页695），叶群摔伤之后也不敢请假而拿一个救生圈垫在屁股下面坚持开会等（页716），不仅生动地增加了回忆的现场感和可信度，而且也在透露当时林彪、江青之间的关系。

作者观察力过人，待人做事也很细致，所以能够看到和记住很多细节。《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这个特点。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吴、邱都是聪明、能干的人。

当然，聪明、能干，也可以有能力去干更多坏事情。但是，在非民主制度下，但凡没有足够的力量，而又能够爬到高位者，那却一定（而不是可能）是干了坏事的人；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是有能力的人，即使是在那样一种制度下，则就不一定是处处干坏事才能有所成就。事实上，改善人类政治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让具备相应才能的人占据相应的权力位置。中国的孔夫子是这么看，西方的柏拉图也是这么看。民主制度有其缺陷，其中一个重要缺陷就是不一定能把真正有治国才能的人选举到有权力的位子上；而专制制度的根本弊病之一，更是早晚一定会退化到庸才当道、黄钟毁弃的状态，掌握权力者除了依靠已经在手的国家机器的力量和欺骗之外则无以服人，更不要说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以有益民众。

有人会说：为什么要津津乐道于高层人物的鸡毛蒜皮？在当今中文世界，对于那种试图了解和分析中共高层政局的努力，近年来有一种甚为强烈的批评，大旨在说这不符合民主理念，将之贬为所谓“宫廷政治学”，据说是与所谓“转轨政治学”相对立的。其实，这种批评似是而非。就理念而言，“民主”就要求增加政治透明度——不是你我平民政治生活的透明度，恰恰是高层权力政治的透明度；就所谓“转轨政治”而言，“转轨”就是从现行政治制度转向民主政治制度，现行政治制度就是你改变的对象——闭目不去了解你所要改变的东西在怎样运作，并不能增加你改变它的能力。在我看来，揭穿中共“宫廷政治”的“厚黑”，恰恰是对于这套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的最为有力的批判之一。看到那样一个为江青摸茶杯的周恩来，想想一九六八年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你是更加相信这是一个“人民的好总理”呢，还是因此发生了某种怀疑？读到“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想想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宣称，你是更加为自己的“国家主人翁”身份而骄傲呢，还是因此感觉受到了欺骗？这种效应，是可以远远超出那些细节讲述者的本来意图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宫廷”细节，其启蒙民众和批判专制的力量，可以抵得上一打民主宣言。

### 三、悲剧背后的历史大脉络

当然，对于没有思考力的人来说，细节可能仅仅是酒后谈资，因为他没有对于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层理解；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无视政治现实和历史细节，那些所谓的宏观把握也往往形同西窗一梦。《邱会作回忆录》从其特定的角度，对一些关系中国当代史的重大问题给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脉络。比如说，一个十五岁参加红军、一家三代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红小鬼”，至死也还忠于这个党，对这个党的事业也有不小的贡献，但却被党视为罪犯，连老母亲都被逼疯了——这说明了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背后有一条历史的大脉络。又比如说，作者经历了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三任总参谋长的崛起和垮台，而且作者与这三个人的个人关系、工作关系都相当好。这三位都是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双重信任才得以登上这一重要位置的，但却都先后成为政治牺牲品。按照作者或明确或隐晦的解释，他们倒台的原因分别是：罗瑞卿后来在林彪与贺龙之间偏到了贺龙一边，而贺龙被认为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助力，所以罗就成为毛打倒刘邓之前“清场”的首战目标；杨成武则试图在林彪与江青之间搞平衡，因而惹起林的强烈不满，结果迫使毛也不得不牺牲杨来安抚林；黄永胜倒是坚定地站在了林彪的一边，最后却被毛一网打尽——这些权力斗争的戏码，难道仅仅说明了“政治

是厚黑的”这样一个道德学的、技术论的“李宗吾原理”吗？我们难道不能从中看出比如政军关系这样的事关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一些涵义吗？再比如，作者称一九八零年对于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审”是一场“闹剧”，他是不是有其道理呢？——无论有没有道理，应该都可以引起人们对于中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思考吧？

全书的主要脉络，无疑还是从“文革”初期到“九一三”林彪出逃这一段历史所揭示的中国政治发展。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毛为什么把自己选择的“接班人”一个又一个地接连打倒？毛和林彪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林彪“九大”成为写进了党章中的“接班人”之后反而政治上走了下坡路？究竟林彪有没有搞所谓“政变”？这类问题，在在关系重大史实，是任何一个想要公正地了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提出、也不能不关心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决非仅仅关系中共“宫廷政治”，除非有人认所谓中共“宫廷政治”是与中国民众的命运不大相干的。邱会作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既记录了很多此前不为人所知的相关事情，也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在我读来，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权欲熏心、残民以逞，其政治手段的虚伪狡诈、翻云覆雨，其政治品质的下流无赖、阴险凶狠，都可以说跃然纸上——尽管作者再三宣示他对毛的敬仰和忠诚，可他笔下的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却把这个迄今仍被膜拜为中国现制度的“伟大”缔造者放到了显微镜下，从而也把这套制度的政治根基、文化基因和人格密码放到了解剖刀下。拿不拿起显微镜和解剖刀来认识与批判这个人 and 这套制度，那可以是一个政治功利的选择；而要不要读邱会作这本书，却是一个起码的知识和智力挑战：不读，你可能成为“睁眼瞎子”，不知道有关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读了，历史就打开一道天窗，那些使用下流手段获得政治胜利的帝王们所编纂的煌煌历史，就会在一个失败者的笔下一缕缕云散烟消。

□ 原载《动向》杂志 2011 年 4 月号

~~~~~

# 【读书笔记】

## 林彪“死党”眼里的毛泽东

• 颜昌海 •

在三年国共内战后，有 926 名国军高级将领被关押，其中大多数人在“战犯管理所”苟延残喘、逆来顺受。然而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些人却在无畏无惧之下说出了心里话。例如有个在 1947 年泰蒙战役中被俘的国军整编 72 师中将师长杨文(王泉)，弥留时毅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共高级将领也未尝不是如此。例如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临死前撰写了一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洋洋洒洒两巨册近千页，从头至尾都在愤怒控诉毛泽东。

吴法宪在林彪的 9·13 事件发生后两周被捕，1981 年 1 月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罪被“特别法庭”判刑 17 年。据看守人员反应，吴法宪是林彪死党中态度最为谦卑者，凡见人必呼“首长”，进门必喊“报告”，在庭审中有问必答。然而他口服心不服，郁结在胸中的怨气全部倾注入 74 万字的回忆录中。他说：“我 15 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吴法宪说，出庭前，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警告他：在庭上可以发言，但不准推翻起诉书上的罪名，否则要判重刑，所以他“下了决心，不申辩，反正申辩也没有用。”然而，判决后，他对

所列“反革命罪行”耿耿于怀，认为“说我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真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强加于人的不实之辞。这20多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向我出示过任何这样的证据……正是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第二，判决书中说他“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根本不是事实。“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赏识和一手提拔分不开的。毛主席亲自提名，使林彪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还决定在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切都不是林彪夺权得来的，而是毛主席亲自选择和安排的”；“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党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还有必要冒着和毛泽东对抗的风险，拿着实权去争国家主席这个排名远远在后面的虚权吗？就算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的竞争、竞选来争取，这应该是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么犯罪行为。”

吴法宪说，“从9·13以来，我一直没看到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在文革中，只有毛主席自己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号召过在全国的夺权。相反，由于林彪、老帅们和我们的反对，在军队中，除了一些文艺团体和部队院校以外，任何军事机关和部队都没有夺过权。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夺权的”；“在文革中，我所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什么反革命集团”；“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党的组织原则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超越这个框框的。事实上，在我同林彪多年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关反对毛主席的只言词组，更不要说是有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搞政变这样的事情。”

关于“诬陷贺龙和罗瑞卿”，吴法宪说：“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和廖冠贤4个人的揭发整理的，不是我个人编造的。罗瑞卿的这顶帽子是中央戴上的，并不是黄永胜和我给他戴上的。如果说，在文革中的报告中或言论中对当时受迫害的领导同志有过类似的不敬语言就是‘反革命罪’的话，难逃法网的应该不止是我们几个，大概是不计其数。关于贺龙和罗瑞卿受迫害的问题，我认为主要责任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决策的，主要安排是他们决定的，两个项目组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全面负责的……在几十年的党内残酷斗争过程中，很难找出几个从没整过别人的党内干部。据我回忆，由毛、周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它人的项目组报告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罪’，牵连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他愤怒地说，“在刘邓等中央相当一部份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它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就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

关于“在空军关押迫害干部174人，致使南空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问题，他认为“这是全国全党搞运动的结果，当时全军共有8万人受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空军只占其中0.2%，其余99.8%受迫害的人又应由谁来负责，各该单位的主要领导是否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全国共有73万人遭到迫害，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都要承担刑责？在审查林彪集团过程中，军以上干部8百多人被整，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中将（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在学习班中被整死，是否也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呢？”；他认为“在打击迫害干部的问题上，从毛主席、党中央到下面基层领导都有错误，都应承担责任，不能只是把我们几个人推出来做替罪羊了事！”

吴法宪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其背后黑手都是毛泽东。例如1967年8月，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王洪文率10万人猛攻，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赞曰：“打得好！”他听到各地武斗的汇报时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他在上海看到电视直播批斗大会中造反派强迫陈丕显、曹获秋低头弯腰，竟说：“这算不了什么嘛！”

对于指责林彪“反军乱军”，吴法宪极为反感。他说：“林彪是军委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大量事实已证明，在文革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吴法宪还揭露，“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这句话是1970年8月19日汪东兴在庐山对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讲的，绝不可栽赃到叶群身上。《程世清访谈录》与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所撰《林彪事件与我》都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

1972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这是指林彪，然而吴法宪说，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除了同意毛泽东意见外，并未说过其它的话。早在1950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与美国直接对抗，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相反，在苏联向中苏、中蒙边境调兵时，林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把重点战略目标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对付苏联。所以，说林彪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是恶意栽赃！现在御用文人说“林彪的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改变的总预演”，吴法宪认为“九大”后林彪名正言顺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政变。防止苏联突然袭击是毛、周的三令五申，战备疏散是预防苏联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伤害聚集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毛周以政治局名义下达疏散令后，才有林彪的一号命令——疏散华北东北西北的坦克、飞机、大炮，当时毛泽东并无异议，不能因为林彪死了，就把他的功劳变成罪行。

9·13后，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在受审查期间，为了“立功赎罪”，便检举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拟定了作战计划。吴法宪说，那是1971年5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改善时，为了防止国军突袭沿海地区宣示对大陆的主权从而破坏中共与美国的谈判，毛周指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了一星期的会，空军按总参指示加强了东南沿海的防御力量，这个作战部署是毛周亲自批准的，何“政变”之有？那个年代许多问题都被渲染、被歪曲了。

对于林彪的遭遇，作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吴法宪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他在书中回忆，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他在北京西郊机场报告周恩来，林彪叶群所乘三叉戟飞机飞出中蒙国界，周恩来遂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吴法宪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际泰：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这些年来许多资料显示，林彪座机在外蒙境内没有直飞苏联，而是在苏蒙边境处调头飞返中国方向，这一举动是由于林彪不想叛国，他强令飞机返回北京，但飞机着陆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吴法宪知道“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么林彪坠机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空军司令吴法宪知道内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让他长期与外界隔绝，直到9·13事件后29年、他刑满13年之后，吴法宪离开居住地济南到北京探亲还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可见当局多么不希望这位9·13事件目击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吴法宪在70多万字回忆录中没有说穿这一点，但他对别人的冤案是看得很清楚的。对毛泽东的“四大秘书”首席——陈伯达被打倒一案，他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23条》、文革的《5·16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的长子吴新潮在本书末之《附录》中也发了一通牢骚。他说，对于他这南征北战、

浴血疆场 19 年的父亲，“有些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30 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蓄意抹杀、歪曲和颠倒黑白，企图让人民群众对父亲另眼看待”。

吴法宪临终前唯一感到快慰的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奉命批斗、审查他的上级、同事、下属，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如吴法宪被拘押在北京卫戍区时，5 次提审他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本是他一手提拔的，居然摆出了“中央首长”的臭架子，动辄训斥他“态度不好”，然而就是这个李震，1973 年横死于公安部的地下室，此案至今未水落石出，但原因显露：他知道的机密太多。空司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9·13 后都主持过空军的清洗工作，且下令关押吴法宪妻儿子女，但不久就被审查，空军参谋长梁璞还被送去农场劳改。由此吴法宪悟出：“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

吴法宪回忆录解开了某些历史谜团。例如中央文革的三根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由于锋芒太露、功高震主，在决策层滥竽年余就去了秦城监狱。毛泽东原来指示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比较年轻的戚本禹转过来，无奈戚本禹恃宠生骄，乐极生悲。事缘江青器重戚本禹，常把戚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骑马、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成自己的母亲，如此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江青的女儿李讷，以至于江青怀疑有妇之夫戚本禹对李讷存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告了御状，说戚本禹此人改造不了，结果戚也去了秦城。另一条花边新闻是：叶群为了拉拢总参谋长杨成武，特地安插杨成武长女杨毅到《空军报》社工作。空军政委余立金为了巴结杨总长，便叫自己的英俊秘书单世充多多关照杨毅。此时杨毅因参加“写作班子”住入京西宾馆，单世充几乎天天往京西跑，还常给杨毅送吃的，接着便向发妻纵素梅提出离婚。纵氏从单世充日记本里发现单与杨毅的合影与诗句，有“春风已度玉门关”一句，于是纵氏到空军司令部告状。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把单世充软禁起来，杨毅则下调四川一个航校当了干事，她到四川不久就含羞自杀，正好杨成武被打倒，发配河南龙门县。

吴法宪回忆录同其他人回忆录不同的是，他透露了一些军事机密。诸如：

（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上报击落美机的数字有假；（据大陆官方宣称，抗美援朝共击落美机 5729 架；然而美国方面宣布，美军空、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损失飞机共两千架；1992 年俄国总统叶利钦致函美国参议院，承认美机在朝鲜上空被击落的，只有 1309 架。）

（二）自大陆空军建军以来，空中、地面事故涨色，每年都要摔掉二、三十架飞机；

（三）1950 年代厦门有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叛逃去了台湾，并在那儿升了官。公安部长罗瑞卿利用一名被捕的台湾特务，向台方发了一个假情报，称那个师长是假投降，结果对岸就把那个师长枪毙了；

（四）有关 1967 年 10 月北京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吴法宪与公安部长谢富治、总理周恩来组成了项目组。案件由天津市公安局破获，但陈伯达不相信一个煤球厂工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认为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如邓小平的秘书才写得出来。

事隔近 40 年，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心理作战处退役的粟明德先生才公开了他起草这张传单的详细情况。粟明德的父母都在镇反时被杀害，1957 年他在北大农学院肄业时，因反右运动深入而偷渡经港赴台。粟明德起草的这张传单由短波电台传到大陆，一位与中共也有杀父之仇的工人抄录油印了 80 份，这是全案的来龙去脉。

把一个北大学生当作邓小平的秘书，这是书呆子陈伯达的误判。

从吴法宪回忆录可以断定，吴法宪讲了许多真话，所以这部书不能在他为之奋斗了 41 年的中国大陆出版，而只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香港印行。

然而，就连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其回忆录也要在香港出版，这对中国大陆，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 来源：作者博客，日期：2011-03-11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